

程看,没有自觉的思想解放也就没有“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运行学派。但是,郑杭生的社会学和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成就并不是发展和开创“中国式的社会学”的结束,而只是一个高峰。郑杭生和社会运行学派的思想解放,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社会学界的思想解放,甚至是否可以说,社会运行学派在往后的再发展中仍然会面临新的思想解放课题,不仅仍然要继续从西方仍处强势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不断“正确定位,加强自主性”,还更要继续以理论自觉精神完善自己,突破自己。社会学界的思想解放,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对社会运行学派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仍有现实意义。

从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生态状况看,从这一学派充满活力并仍在继续发展壮大的学术共同体看,我们有信心期待社会运行学派还会有新的学术贡献和新的学术高峰。

参考文献:

- [1][12]洪大用.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及其意涵[J].学海,2010,(2).
- [2]郑杭生.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自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
- [3]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60.
- [4]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9.
- [5]郑杭生,李强等.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
- [6]费孝通.社会学的探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5.
- [7]龚长宇.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3):24.
- [8][14]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导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
- [9][10]王道勇.元理论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C]//郑杭生.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6.
- [11][13]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2:340,366.
- [15]李潇潇.理论自觉与中国的学术话语——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9-9(5).
- [16]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N].光明日报,2009-10-20(11).
- [17]郑杭生.费孝通对当代中国社会学贡献的再认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5-11(10).
- [18]郑杭生,吴平清.2010年社会学发展回顾与反思[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2-28(20).

作者简介:董翔薇(1966—),女,齐齐哈尔大学学报主编,编审,主要从事社会学、社会理论和哲学研究;董驹翔(1936—),男,河北乐亭人,齐齐哈尔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哲学、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胡雯君;校对:叶子

“理论自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 ——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立场及意义

吴平清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提 要: 从涉入社会学研究以来,郑杭生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以及“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他在对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持续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当前资本主义危机,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遇。坚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缘走向中心、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 键 词: 郑杭生;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C9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2)03-0009-06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之际,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明确提出和阐发了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的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①郑杭生关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概念与命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一概念与命题一经提出,就得到中国社

会学界高度认同与强烈共鸣,而且也必将对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由边缘走向中心、更好地服务和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产生持续而重大的影响。当然,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自觉,不是表现在他近年提出了理论自觉命题,纵观其社会学学术历程就可以发现,郑杭生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学者“理论自觉”的典范。郑杭生一直注重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建设,对此,有人简单地理解为是在为社会学正名和争取发展空间。

实际上,所谓“为社会学正名”的思维,仍是一种将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起来的思维。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以及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对立确实一直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郑杭生通过澄清某些认识误区来为社会学正名,但其目标远不限于此,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贯穿于其整个社会学学术历程,郑杭生无疑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一面旗帜。本文试对郑杭生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觉及其贡献进行初步探索。

一、郑杭生理论自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

关于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马克思把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学视为“资产阶级学术”,并以其为对立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批判指出,“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1]602},“我作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2]227-228}。因此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拒绝采用孔德创造的“社会学”这一名词;也不难理解,很长时期内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同流派,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攻击的主要目标。^[3]由于马克思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及其思想的这种尖锐批判,再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思想体系中很少提“社会学”,这就使得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是势不两立的;或者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使得以缓解社会矛盾为基本属性的社会学难以在逻辑上认同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学的历史上,将马克思视作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实际上是出于20世纪晚期社会学家的事后回顾”^{[4]22},而且,也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为冲突论的鼻祖或阶级斗争学派。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这些认识无疑是限制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障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也因此而受阻。为社会学正名或争取社会学的合法性则成为社会的任务之一。社会学在新中国一度被取消和受批判,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对立起来的认识无疑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使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时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是困惑重重。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在当时似乎已成共识。就连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当时也极具眼光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努力实现现代化之时,社会学恢复后就要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但“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5]费孝通作为中国社会学坎坷命运的亲历者和恢复重建的主要领导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建设的根本方针性的意见,就是要把社会学建成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6]。但是,在恢复重建初期,中国社会学仍然“正处在一种既热门又充满争议、既有吸引力又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的状况之中”^[7]。在社会学对象问题、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方面,尚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

郑杭生在哲学方面已取得显著成就的时刻,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理论自觉,自主选择转向社会学的学习与研究,并于

1981年11月到布里斯托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分析哲学。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在改革开放之初到资本主义的英国去学习长期被视为与“资产阶级学术”的社会学,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张力,无疑促使郑杭生首先要思考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中国现实的关系。在英国进修社会学期间,他阅读和思考的一个重点就是检讨西方社会学的长处和短处,梳理和分析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之异同,由此也取得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即“革命批判性形态”和“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理论发现,在1985年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和1986年发表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两篇论文中,郑杭生对这一理论作了明确阐述,并提出了“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主张。

实际上,马克思对孔德及其社会学的批判,揭示了西方社会学的资产阶级本质,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思想或反对社会学。正如列宁所分析的,马克思在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探明了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上”^{[8]10},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科学的社会学”^{[9]7},唯物辩证法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10]32}。郑杭生认识到,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实质上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虽然其中也有批判社会学的流派,但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革命批判型,其根本任务是揭露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及其根源。革命批判性形态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过渡性或预备性的形态,在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重要的形态,它要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11]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又是统一的。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维护的对象是根本对立的,但是要维护这一点却是相似的,西方社会学具有较长的维护的历史和经验,其中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和批判地汲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放性的要求,因为它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是离不开人类文明大道而发展的。^[12]这些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刻分析,不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形态及其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放性和发展性。郑杭生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和“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等论断和创造性成果,在理论上解决了在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社会学对象问题等方面认识上的混乱,对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地位的确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也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关于这一点,可以以当时胡绳同志对郑杭生这些观点的高度肯定为例证。1986年郑杭生在《社会学研究》创刊号发表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文,受到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同志的好评,认为郑杭生解决了社会学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在1957—1958年间,胡绳写下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的意

义》、《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札记》等数篇关于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发言和论文,洋洋数万言。^{[13]201-306}胡绳对社会学的这些批判文章,虽然与当时取消和批判社会学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但许多批判确实是建立在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学者的研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许多批判言之有物、分析细致、逻辑严密。其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的意义》一文,胡绳还将其选入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绳全书》(第二卷)中。在1986年4月26日中国社会学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胡绳同志在关于《谈谈社会学研究》的讲话中指出,“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总的说来,是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稳定社会秩序”,社会学者认为无须社会革命,就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当时以革命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不能承认这样的社会学的。^[14]就如日本社会学家福武直所指出的,中国社会学自1930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影响,但仅“限于对英美系统的社会学理论的生搬硬套,不能超出基督教系统的大学以慈善的社会改良运动为前提的社会实验区调查的范畴”,“在多数场合下,同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并无联系”。^[15]胡绳同志在此次讲话中,除了对费孝通关于发展中国社会学的相关意见表示赞同外,还大量使用和吸收了郑杭生的相关概念和观点,郑杭生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主张,关于社会运行状态类型的划分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运行实践的分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判性和维护建设性两种形态,以及如何看待和利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等方面的观点,基本上都为胡绳同志所认同和借鉴。^[16]

胡绳同志评价郑杭生解决了社会学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指在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初期,虽然承认社会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实际上在理论上二者仍处于“两张皮”状态,郑杭生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认识,以及我们要建设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张,真正在理论突破了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两张皮”的状况,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社会学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仅仅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为冲突学派的西方社会学史来说,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发现,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理论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它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障碍与困境。实际上,这一理论认识的影响不限于社会学,如政治学者由此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革命性和建设性的形态。可以说,这一理论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和贡献。郑杭生在其社会学学术历程早期所取得的这些创造性理论成果及其所受到的认同,充分表现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家的杰出品格,也充分体现了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构建方面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

二、郑杭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觉及贡献

(一) 社会学对象问题探索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向

郑杭生对于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思考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为其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探索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他提出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

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定义,正是基于他自觉地立足于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同时期社会运行状况的概括和总结,借鉴和吸取了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也继承和开发了我国历史上丰富的治乱兴衰学术传统思想,并结合了对社会学传入中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学命运的反思性考察。

这一定义充分把握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澄清了许多长期以来困惑与混乱,适应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因为就如郑杭生所分析的,把社会学对象规定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在理论方面,有利于将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研究领域和范畴统一起来,有助于把握社会学与作为哲学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与联系;在实践方面,这种界定找到了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结合点,我们所建设的社会学,是要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个角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17]

(二)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立场与方法的坚持

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学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使得社会学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郑杭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及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正是建立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发展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辩证思维方法、理论视野的开放性与发展性等方面,他都坚持并灵活运用;对于马克思的批判立场,他又以发展的眼光,通过对“革命批判”与“建设维护”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予以发展,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的概念和方法。

郑杭生一直主张,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分清它的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对于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为辩证唯物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活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根本观点”要坚持和丰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程作出的“具体论断”,要根据社会实践的变化加以校正和发展。要反对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和“教条论”的极端态度,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急剧社会变化中,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为指导,自觉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吸取国外研究中的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不断得出与客观实际相符的具体论断,并以与时俱进的具体论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8]

郑杭生系统受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训练,深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他的许多社会学概念定义、思想、分析框架和方法论,都贯穿着辩证法思维。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持和对唯物辩证法的灵活运用,使得郑杭生在当代中国社会复杂思潮中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使得他的社会学理论既能够避免“左”,又能避免右,在关于科学性、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建设性与批判性、阶级与阶层、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社会协调和社会失衡等诸多理论问题和复杂社会现象上,他都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这种不“左”不“右”的立场和治学态度,有人误解为是“价值中立”。实际上,郑杭生对“价值中立”

一贯持分析批判态度,他认为“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其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19]

快速转型使得当代中国社会表现出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共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这种状况,使得人们在认识上往往发生偏差,或者只看到希望、优化、进步、协调而盲目乐观,或者只看到痛苦、弊病、代价、失衡而盲目悲观,甚至导致否定一切。^[20]对于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界一些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一味作片面批判、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的做法,郑杭生提出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即要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要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全面把握中国社会的正反两面,分清主次,正确引导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积极参与各层次的制度创新。^[21]“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可以说是郑杭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思想的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要坚持革命批判的立场,对社会主义社会要坚持建设维护和“建设性反思批判”的立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对于中国社会建设实践和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学界一些学者不顾中国实际盲目套用西方的概念与理论框架的做法,郑杭生提出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在借鉴西方理论与经验时,必须要以我为主,坚持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在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方面,尤其要警惕西方理论及其话语中可能对我们带来消极导向和有可能陷入理论困境和现实陷阱的东西。对于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公民社会理论等不符合中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实践的理论,郑杭生也作了深刻批判。他指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而绝不是如狭义转型论分析的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是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进程,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共同探索。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并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不断致力于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22]对于一些学者以公民社会理论为分析框架所提出的通过“劳资博弈”等机制建设“公民社会”、“能动社会”以达到社会重建的话语,郑杭生结合中国社会(社区)建设实践做了深入分析与批判,认为“公民社会理论”这一被神话了的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并不被西方完全实行,更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这些批判,澄清了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困惑与陷阱,为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指明了正确方向。通过这些批判,也推进了新型

现代性、新型社会主义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我们从中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立场和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是中国社会学的根本方向,也是提升中国社会学在国际学术界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三)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持续探索

在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和“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理论之后,郑杭生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建构,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等多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论文,《改革开放30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问题》等论文,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郑杭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持续探索,一方面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梳理来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是根据世界和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在1991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词条中,郑杭生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开放性,只有采取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态度看待西方社会学,实事求是地利用其中合理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才能真正占领有关的理论阵地,才能真正高于西方社会学。^[23]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四个不可或缺的部分。^[24]他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的社会学分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方面。郑杭生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社会学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理论及其特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学思想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25]

郑杭生更注重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他指出,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关系,在社会学学科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搞清楚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26]他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维护性的立场,致力于研究和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通过深入分析,他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执政党需要实现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从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到作为激励机制、从“斗争哲学”到“社会和谐”的转变。他还自觉推动这方面认识的转变,例如,早在他在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社会学理论”部分主编时,就主张将按照生产资料来划分的“阶级”概念纳入到以“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区分的“阶层”概念中。^[27]

(四) 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成就

郑杭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更重要的贡献是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现实所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上。

费孝通指出,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研究社会现象时往往会借用西方的社会理论,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西方社会理论的产生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们是西

方社会科学家在自己的社会现实中,深入调查研究,并对其进行总结概括的结果,而且也需要随变化着的现实社会反复加以修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离开它自己的社会实践就很可能丧失它的生命力。^[28]帕森斯对韦伯的分析也指出:韦伯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着眼于西方社会的总体制度结构,去解释“现代资本主义”。^{[29]81}

对这一点,郑杭生教授是有清醒认识和高度理论自觉的。他认识到,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社会学又反过来推动转型过程的比较顺利、比较健康的运行。而且,“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30]

郑杭生正是坚持自己在进入社会学之初立下的“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学术目标,立足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途径构建中国社会学理论,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已形成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动论和实践结构论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是从社会运行、社会转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或社会实践结构等角度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巨大而复杂的变化的理论概括与总结。

这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又从各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重要的推动。例如,在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分析上,社会互动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突破了西方社会学的二元对立思维,认为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和社会中间还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如群体、阶级阶层、社区等,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既有对立冲突,也有协调整合。当代全球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各种矛盾与问题也是相互对立冲突、相互依赖并存、相互型塑和构建的,而这种复杂关系中,和平与发展、平等互惠、协商对话、强弱双赢是时代基调。在“实践结构论”中,对当今世界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恶化、有形劳动地位急剧下降以及由此所推动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两极化趋势所做的深入分析,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批判立场。这也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分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危机上仍有强大的解释力,也明确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事实,其价值上和道义上的不合理性,从而阐发了人类解放的目标”,“在对待历史的长波趋势与具体的社会冲突、现实感受与理想主义、激进的批判与浪漫的想象等等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本身提供了如何避免理路和方法的一维性、单向性的研究典范”^[31]。

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既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意识,又有深入实际的草根情怀的“顶天立地”精神,使得郑杭生能够抓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最紧迫的和最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深化认识,探索规

律,努力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回答,从而也使得他的社会学理论始终能够立足实践而又高于实践,能够准确把握社会变迁的方向与命脉,及时发现社会变迁与发展过程中的新要素、新类型,并及时做出概括与总结。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更加关注社会建设、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通过剖析一个个基层、地方和部门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中成功的案例,探讨其各自的特点,并加以横向比较,从而探索社会、社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如默顿所指出的,“在社会学家的世界实验室中,就像跟在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更封闭的实验室中一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成功的实验,而不是在这之前的一百零一次失败。从一次成功中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多次失败中学到的要多。”^{[32]305}注重研究成功案例,在方法论上,也是与郑杭生所倡导的“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相一致的。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话语权的提升

郑杭生就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已形成了社会运行论等相对系统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已成为真正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过程中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取得发展的必由之路。

不过,总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仍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其原因不仅在于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实证主义等西方社会学流派的影响,而且也在于中国社会学的自我意识不足,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看作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33]

近年来,郑杭生通过对“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的明确阐述,“理论自觉”意识更明确、更强烈、更主动,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学进入了强调“理论自觉”的新阶段。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遇,我们要通过提炼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来回应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增强社会学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

此外,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和世界困境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遇。就如贝克所分析的,传统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无论是结构主义者、互动论者、系统论者或是批判学派,都不足以解释现在的世界局势”^[34]。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蕴含着同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不同的基本立场、理论构架、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至今仍有勃勃生机的根据所在。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不仅至今未能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反而形成了不少偏见和片面理解。现在需要系统、深入地总结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澄清对它的偏见和片面理解。^[35]

当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及其造成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向全球的蔓延,使人类陷入空前的困境。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才能正确把握新时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与内在逻辑;也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判立场,才能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及其根源。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革命批判的分析,同时也正是对

社会主义进行建设维护的重要方面,这对遏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在全世界的大行其道,对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对于世界和人类的借鉴意义的认识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学会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缘走向中心、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和任务。

注 释:

①郑杭生在中国社会学会2009年西安学术年会的主题报告中明确提出和阐述了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此报告以《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为题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24期全文转载,《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8日也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为题摘发。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2]马克思.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利斯[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3][7][12][17]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J].社会学研究,1986(1).
- [4][英]克里斯·希林·菲利普·梅勒.社会学何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5]福武直.中国社会学的复活和现状[J].日中经济协会会报,1982(7)//邢铁华.论胡绳同志《谈谈社会学的研究》[J].学术界,1986(1).
- [6]费孝通.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此文是在1982年5月22日中国社会学会年会上的讲话)[M]//费孝通全集(第9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8][9][10]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M]//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郑杭生.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N].光明日报,1985-7-29.
- [13]胡绳.枣下论丛(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14][16]胡绳.谈谈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86(3).
- [15]福武直.中国社会学及其复活[J].国外社会科学,1980(6).
- [18][26][27]郑杭生.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诞辰185周年而作[J].理论学刊,2003(6).
- [19]郑杭生.究竟如何看待“价值中立”?——回应《为“价值中

立”辩护》一文对我观点的批评[J].社会科学研究,2000(3).

[20]郑杭生.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日益成熟的中国社会学[M]//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1]郑杭生.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

[22]郑杭生,杨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对新布达佩斯学派中国版的剖析[J].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2);郑杭生.坚持和发展共同理想的几个问题——从社会学视角看新型社会主义[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2);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N].光明日报,2009-12-3.

[23]郑杭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M]//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24][35]郑杭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

[25]郑杭生,洪大用.特色鲜明内容精练——《社会学概论》简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6).

[28]费孝通.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应[J].社会,2000(7).

[29]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30]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M]//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31]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6).

[32]罗伯特·K.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3]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与机遇[J].江海学刊,2008(5).

[34]张小溪.社会学的“世界主义时刻”——访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8-11.

[35]郑杭生.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面临的创新任务——一种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视野[J].社会科学战线,2007(1).

作者简介: 侯平清(1975—),男,甘肃舟曲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竹君;校对:叶子